

生存与命运

◎〔苏〕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I512.4
244 C₂

生存与命运

◎ (苏) 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工人出版社



前 言

—

象《生存与命运》的问世这样充满了戏剧性的书，世界上大概不很多。早在1961年，本书即已完稿并送到了《旗》杂志编辑部，该编辑部视之若不祥之物，惶惶然唯恐连累自身，急忙将它上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是作者的住所遭到彻底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物什例如打字纸和打字色带等全部被收缴。

作者愤而上书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

为什么要对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要对我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而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加以禁止？为什么要对我的这部书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且把它当作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如果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么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

让我 30 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作出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谎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严永兴译自苏《文学问题》杂志 1988 年第 10 期 P28)。

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阿朱别依回忆,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看过此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他没有给作者回信。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接见作者时宣称:“您别再想这部长篇小说。200 年后出版它也许可能。”

这实际上宣判了本书终生监禁。所幸的是这部手稿被拍入微缩胶卷,不知通过什么秘密渠道越过苏联的西部边界流传到了国外。1980 年,瑞士率先出版了它的俄文本;1984 年被译成德文;1986 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1988 年,本书在漂泊欧美 20 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在它与之血肉相连的人民的心里落地生根。

《生存与命运》所到之处,无论是瑞士、西德还是北美以至它的故土,都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读者的踊跃购书和争相传阅自不必说,许多很具权威性的评论家也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前言”中说:“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苏《十月》主编阿纳尼耶夫在 1988 年 8 月 24 日的《文学报》上撰文指出:“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罗纳德·欣利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86 年 3 月 9 日)中写道:“《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格罗斯曼对重大主题的高度

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

作者格罗斯曼已经永远听不到这些热烈的赞扬了。他已于1964年患癌症逝世，享年59岁。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终生追求真理和理想的艺术家来说，这种似乎相反相成的矛盾命运倒不鲜见。是幸运还是不幸，谁也难以说清。

二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生存与命运》的基本情节框架。作者以这场震惊世界的战役结构全书是很有深意的。战争的残酷能迅速地使人的灵魂曝光，英雄和懦夫往往在瞬间显露其本质。而在敌我双方的力量彼此急剧消长并转换的关头，最能检验出人的全部复杂性。于是作者笔下出现了许多以血肉之躯阻挡法西斯军队凌厉攻势的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如与“6·1”号孤楼同归于尽的全体官兵，在炮火下坚守岗位的发电厂工人和厂长，等等。也出现了象格特马诺夫这样专以告密来攫取高官却总是得逞因而踌躇满志的人。但作者的本意绝非止于表现人民反法西斯的英雄壮举，虽然这壮举值得大书特书并将永远书写不尽。作者的笔在敌对双方的战场以及各自的后方，在集中营、劳改营、监狱之间自由驰骋，在现实场景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纵横捭阖。空间的广阔和情节线索的繁复赋予了小说以恢宏的气势，也使作者得以更自由的寄托某些沉重的思考。这些思考存在于上述各种斑斓驳杂的生活场景之中，又超越了它们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

重新审视与评判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是作者探寻的问题之一。在他写作此书的年代，虽然斯大林在30年代

的暴行早已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示出来，但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罪责并为那些冤魂鸣不平仍然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一种论点依然在苏联国内外有市场：残暴的手段固然不足取，但只要为了崇高的目的，就不必苛责这残暴；而且肃反还铲除了“第五纵队”产生的根基云云。本书透露的思想却认为，消灭富农、枪杀政敌、党内无情的大清洗等等，残害了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真正崇高的目的不应接受这样血淋淋的祭礼，屈死者的冤魂并不能铺设通向崇高目的的道路。或者说，滥行非人道的手段，本身就是对这一崇高目的的亵渎和背叛！

作者用了一些篇幅讨论生命与暴力、自由与奴役等形而上的问题。他无疑是赞同这样的哲学思想的：“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和奴役、无生命物质和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就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产生幸福和自由。”

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把世界变作了人类的屠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斯大林滥杀无辜，也阻碍和窒息了人的进化。残虐和专制常常惊人的相似。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之所以在纳粹小头目里斯的攻心战术面前一度惶惑，原因就在于里斯道出了这种相似之处。事实就是事实，一旦剥去了罩在它身上的饰物，它有时会丑陋和残酷到叫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然而，无论它多么怵目惊心，人不能在它面前闭上眼睛，否则，人的进化和社会的清明都将无从谈起。

苏军将士浴血死战，为的是拒绝纳粹的暴力和奴役，为的是民族、正义和战后得到更大的自由。他们不是为斯大林而

战。不论是战场掩蔽室里的战士们对于战后生活的憧憬，还是冻土地带劳改营里苦役们的渴望，或者是被捕者亲友们的爱憎，都透露了人们对恐怖高压气氛的恐惧和反感。一切迹象都表明，肃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恰恰是削弱了人民的向心力。那种以为肃反有助于卫国战争的论点是不攻自破的。

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肃反的严重后果，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在前线军队的溃败之际曾心慌意乱。因为他深知假如战争失败，他将受到双倍的惩罚——来自于法西斯的和来自于人民的。然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他似乎安祥地睡着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不仅是他对敌人的胜利，而且也是他对过去的胜利。因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作为苏军统帅的斯大林，显然以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掩盖了作为暴君的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过。

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争论不已的话题。当功勋与罪过集于一人之身，在评价上的倚轻倚重就不易平衡也不应平衡。历史的功过需要历史来验证，在这里任何伪饰和避讳都是不能取信于天下的。功即功，罪即罪，泾渭分明，二者不能彼此取代和相互掩盖。作者没有写斯大林在指挥席上的作为而是更多地写了他的罪责，立意恐怕就在于此。

作者似乎站在历史的峰巅上俯瞰人类的命运。他认为本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科学上的伟大发现、革命浪潮、社会变革、两次大战，这一时代既辉煌又沉重，人类进步的阶梯崎岖艰难。起义、反抗、革命、暴政，秩序纷乱，轰轰烈烈，造成了英雄也培养了庸众。但群众性的绝对服从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请看，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长长的队列，在鼓乐声里默默地走向毒气室；善良无辜的人意识到将被逮捕，没有申辩或逃脱的欲念，驯服地扛起事先打点好的行装走进

了他们亲自建筑并守卫过的集中营，一面在内心搜寻自己的罪恶。这种绝对服从说明了人对于“神”的敬奉和畏惧已经发展到了否定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程度，也说明了极权主义超暴力已经使人们麻木不仁。在这时，暴力甚至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狂热的对象！

从动物进化成人，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但由人退回到动物，却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并且比动物更凶残更可怕。作为人类良心的代言人，格罗斯曼痛恨一切类似于动物的残暴行为，他追求的是更合理的存在。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然而人类也许永远不能理智地控制自己，暴力可能与人类的命运相伴始终。这是过去、现在，也是未来的人类面对的最重大的难题之一。

三

仅有冷峻的政治批判，还不足以构成史诗般的艺术规模。《生存与命运》震撼人心的力量，还得力它对人性的毫不容情的剖析。挖掘和拷问人的灵魂，为本书增添了深邃的意蕴。本书中的主人公之一，物理学家斯特拉姆，就是作者着力剖析的人物。

知识渊博、修养高深、具有很强的独立人格意识，斯特拉姆无疑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不为保全自己而趋炎附势，不因处境危艰而摧眉折腰，淡泊名利，荣辱不惊，他只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虽然当处于极端孤立、领导者与同事对其群起而攻、好友也远避三舍的时候，他也曾惶恐惊惧，也为被捕、流放甚至处决等噩运的随时可能降临而惴惴不安，为认不认“罪”而一度寝食俱废，但这无损于他的人格。在

“清洗”的阴影笼罩下泰然处之的能有几人！何况斯特拉姆并没有扭曲自己。时局险恶，卑躬屈膝、投石下井，滔滔者天下皆是，斯特拉姆却傲然挺直着精神的脊梁。

大有深意的是此后发生的事：斯大林给他打了个电话，不过寒暄了几句，聊了几句家常，但这已经足够了，斯特拉姆从万难逃脱的困境中被解救，被托举到了众人仰慕的地位。他的所有的要求都得了满足，种种危险都远离了他。然而奇怪，斯特拉姆却产生了新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是陌生的，却确实确实地存在，象盘踞在他心里的蛇。它比刑讯更难熬，比死亡更可怖，因为它能消灭人的良心和尊严。

这种不安全感是对已经拥有的一切惟恐失去的防范心理。这是微妙的心态转换。当斯特拉姆被剥夺得只剩下尊严，他准备以死来捍卫它；但当荣誉、权利簇拥着他，特别是这些利益来自于最高领袖的垂青的时候，他开始重新考虑得与失。一无所有，所以不怕失去；意外得之，便怕得而复失。要命的是斯特拉姆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因而他更加惶惧。他现在同样不愿失去尊严，却又隐约感到自己对于已经获得的一切的依恋，他觉出了自己的懦弱又无法驱除这懦弱。鬼使神差，他在那份极不公正的决议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固然有别人欺骗的因素，但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良心已经失落，他已经不是往日那个斯特拉姆了。

斯特拉姆灵魂中一个隐秘的角落被作者揭示出来了。恐惧、希冀、爱、恨等等发展到了极致，对人来说无异于苦刑，高明的作家就用这苦刑去拷问笔下的人物。作者有点象被鲁迅先生推崇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把这苦刑施加于斯特拉姆，后者就在痛苦的呻吟中辩解和供述着自己的善与恶。结果，不但剥去他“表面的洁

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斯特拉姆的灵魂当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灵魂健全得多,并且格罗斯曼由于同时兼顾政治批判,在斯特拉姆头上挂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因而斯特拉姆的罪恶便显得不很深重。然而,德高望重又如此珍重精神高洁的斯特拉姆尚且一度迷失了人生的正路,何况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作者无疑是忧虑深广的。

善与恶,也是本书中几次出现的中心议论话题之一。作者借他人之言阐发了自己对这一矛盾的哲学思考。

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善并不存在于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存在于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不存在于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中。因为在这些杰出人物高举的“善”的旗帜下,历史充满了残暴凶狂,人类的脚下血流成河。真正意义上的善是平凡的人们在自己的心中怀有的对生命物质的爱,是他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对生活的热爱。“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是没有证人、没有想法的小的良善。”它在宗教的和社会的善之外,它的特征是本能和盲目。这种傻瓜似的良善,就是人性。正是它的存在,才使人类历史得以延续,才能使人可以说:生活不是恶!

作者对恶的强大与善的弱小无疑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认识,但他对人类并不悲观。他借别人之口道出了他的信心:“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历史的大战。但如果今天人性没有在人身上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作为这种理论的形象佐证的,是格列科夫命令热恋中的男女战士走出死亡,是叶尼娅义无反顾地到卢布扬卡监狱探

望过去的丈夫，是农妇掩藏了受伤的士兵……也是斯特拉姆沉重的负罪感和忏悔式的内心独白。

四

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俄苏文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严格的意义上，它的文学史并不很长。当西欧和东方诸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学的时候，俄国文学还停留在民间传说和口头创作等较为初级的阶段。它在18世纪迈开大步，19世纪便蔚为大观。自普希金始，一个又一个杰出的诗人、作家陆续出现，辉耀在璀璨的文学星空。列夫·托尔斯泰把俄国文学推上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肖洛霍夫作为他的当然继承人，向世界显示了苏联文坛犹有浩荡雄风。

关注民生与社会，一直是俄苏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多写永恒的主题，例如战争、和平、爱、恨、生、死等，也是它的特色。而且这两个特点结合得好，既重实际又多玄想，“实际”并不滞涩，“玄想”也有根基。俄苏作家的独立人格也较强。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不屈从于官方指令或追赶众人趋之若鹜的时髦，只用自己肩上的头颅思考和评判人与世界。热爱生活，同时热爱艺术，这就具有了双份儿的宗教狂似的痴迷，为这痴迷遭流放杀头的也大有人在。上天空空如也，地上只有人。为人生而艺术，似乎是苏联文学家约定俗成的从艺宗旨。如果外邦及后世的译释没有曲解，那么，“文学是人学”，正见出这一国度里的文学家的执着信念。

由于以上的这些特点，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的文学，轻灵者有之，怪诞者有之，荒诞者也有之，它们都以独有的风格丰富了文坛，却很少有以卖弄文字技巧为能事者获得大量崇拜

者的事。游戏人间的文学很难挤上它的神圣殿堂。它的最优秀的文学传统和现状依然是严峻地面对人生。因此，厚重沉实，博大雄阔，浑涵汪洋，是它的基本的风格基调。它有时不免显得笨拙，这是由于它认真到了迂执的地步所致。

苏联文学在许多年中被强行纳入狭窄的航道，由此产生了一些博得一时喝采的名篇，但时过境迁之后即会显出其虚假和苍白。肖洛霍夫结撰史诗的才能似乎难以为继。但真正优秀的作家仍在被冷落歧视甚至被流放中默默地笔耕。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依然恪守不渝，而不幸的遭遇又使他们得以窥见历史的真面目。所以这部分人的作品往往代表了几十年来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日瓦戈医生》、《生存与命运》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倒不一定奉格罗斯曼在本书中思考的理论为圭臬，但他的人格、胆识和艺术才能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就以结构的宏大、事件的繁复、意蕴的深沉以及它们组成的合力撞击读者的心灵之猛烈而言，本文前引的那些赞誉并非溢美之辞。格罗斯曼可以称得上是肖洛霍夫的合格继承人。

《生存与命运》能够在苏联公开出版并获得广泛赞誉，显示了苏联政治改革的勇气。彻底清理历史旧帐，便是改革的先声及其本身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才能抹去至今残留于世的暴政的阴影，使人民扭曲的心灵得以舒张。也显示出苏联国民比较优良的心理素质。他们非常自信，因为他们率先建立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一度维系了人类的梦想；他们曾经东冲西突，为消灭法西斯建立了殊勋；他们使一批国家跟随其后，支撑了世界的半壁江山。这种自信心是非常宝贵的精神力量，很可能把苏联推上更为强大的地位。《死魂灵》中有一段精采的抒情可以给予今天的苏联：

“你不是也在飞跑，俄国呵，好象大胆的、总是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吗？地面在你底下扬尘；桥在发吼。一切都留在你后面了，远远的留在你后面……你们神奇的马呀！有旋风住在你们的鬃毛上吗？在每条血管里，都颤动着一只留神的耳朵吗？你们倾听了头上的心爱的歌，现在就一致的挺出你们这黄铜的胸脯的吗？你们几乎蹄不点地，把身子伸成一线，飞过空中，狂奔而去……”

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严永兴先生首先发现了本书的价值，他即刻向工人出版社推荐。他亲自动手翻译，并邀请曾获全国文学译作彩虹奖的郑海凌先生一同来做这项艰巨的工作，郑先生欣然合作。严先生译了第 27 节至第 137 节，郑先生译了第 1 至第 26 节与第 138 至第 198 节。洋洋 70 余万字，其中又多有军事术语和物理学专业用语，译起来很不容易。但二位先生的译笔力求做到既“信”且“达”又“雅”，并不因国内有另外几家出版社在组织人抢译本书而草率成篇。严先生在统筹全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更多的却是他们的互相切磋、补充、润色。交稿后仍然数次跑出版社，为排除某一疑点、为一字一句的改动反复推敲，他们的功力与苦心在译文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希望本书能得到读者朋友的喜爱。因为我们不仅可以从书中看到别一个国度在遥远的岁月中充满了血与火的故事，还可以得到能激荡灵魂的泪与笑的撞击。掩卷之后有如立峰巅般的畅快，也许还能获得一些本国文坛不多提供的精神钙质。

(本文所引有关《生存与命运》的资料均由严永兴先生提供,在此顺致谢意。)

莫 多

1989.3.21

—

大地上晨雾茫茫。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天没有下雨，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开亮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一个充满直线的空间，各种直线把雾霭笼罩的大地和秋季的天空切割成许多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着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驶着，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的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的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陋舍表现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

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象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活的独特性的地方，生活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那只留神而又散漫的眼睛注视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看得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手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闪过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跟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正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迎面驶来的列车的汽笛声。火车司机对助手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与驶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迎面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的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乎乎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手打了个手势，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决不会拖到凌晨4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似乎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使得老头儿感到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直接驶进卸

货总站吧。”

二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知识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谈话。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谈话、争论、唱歌。

同他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甫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 56 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犯人：带红布条的是政治犯，带黑布条的是怠工者，带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连在了一起，精通分子物理学和古代手写文献的专家们，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署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那个在往昔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常因胃口不好使得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那个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同去上工。他们穿着同样达达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看 Kostträger（铁桶搬运工）来了没有，一些区段的俄国囚犯们用俄语译音称呼他们。